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

中国转型经济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

● 王振中 主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 ▶

中国转型经济^① 政治经济学分析



王振中 主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转型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王振中主编. —北京: 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2.11

ISBN 7 - 80155 - 499 - X

I . 中… II . 王… III . 经济体制改革 - 理论研究 - 中国
IV .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6295 号

出版发行/中国物价出版社[电话:68012468(编辑部) 68033577(发行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院 3 号楼 邮编:100837]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河北省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印张/15.125 字数/376 千字

版本/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 - 80155 - 499 - X/F·361

定价/26.00 元

关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序）^①

王振中

关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政治经济学分析，是由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时期的重点研究课题。该课题组由院内外十几位学者组成（详见文末附注），自1999年春季开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课题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这些理论进展可以分为九个方面：

课题研究的第一个方面是分析了社会主义转型经济的制度变迁背景。其中，主要见解有四：

见解之一是在总结和归纳了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对“转型”概念的几种典型界定后，提出了对分析转型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即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二重基本结构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在一个以生产发展一定阶段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着两个基本的既紧密联系又在一定意义上相对独立的经济关系子系统，即生产关系系统（纵向经济关系系统）和交换关系系统（横向经济关系系统），亦即“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

^① 由于本书的主要分析对象是中国，故出版时将书名称为《中国转型经济政治经济学分析》。

纵坐标”。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理论经济学，就是要对人类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这两大经济关系系统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及在历史和现实中结合的具体形态进行研究。从社会经济形态的二重基本结构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出，相当多的研究者一般都偏好用比较流行的“市场化改革”来统称经济改革和转型经济的性质和内涵，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就对交换关系系统的改革和“复归”来讲，转型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化改革；但就对生产关系、产权关系的改革来讲，却是存在着不同基本社会制度的选择。因此，笔者认为，这一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二重基本结构的理论应该是考察和研究转型经济的基本理论框架。依据这一基本理论框架，可以从生产关系系统和交换关系系统两个方面的演进、改革及其相互联系来界定转型经济，即转型经济既存在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存在着基本社会制度的选择，那种把不同国家的转型经济只区分为“激进”和“渐进”两种“方法”差异的见解，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这种分析方法掩盖了不同国家的经济转型存在着不同的“方向”选择问题。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来讲，“转型”不能“转向”，经济转型是要转变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

见解之二是强调了强势利益集团对转型经济成效的主导作用。在经济转型绩效差异的原因分析方面，国外许多学者都强调初始条件的差异对转型绩效的决定作用。笔者认为，虽然初始条件对转型的结局和成效是有影响的，但初始条件决不是改革成功的决定因素，经济发展程度低并不绝对是有利条件。实际上，造成转型结局和成效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强势利益集团对转型经济绩效的主导作用。作者从政治经济学注重社会阶层和各种利益集团的状况和相互关系的角度，对俄国决定和主导经济转型走向的社会

利益集团变动的状况进行了审视。指出，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正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主导下，制度变迁历经了制度僵滞、指导创新和变迁逆转的三个阶段，整个过程与俄罗斯强势利益集团的性质演变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见解之三是深入探讨了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内涵。笔者认为，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取代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无疑是市场化改革，但这只能称为是狭义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市场化改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问题，其内涵还要丰富得多。从经济主体的角度说，市场化是一个功利化、“经济人”化、契约化、平等化、自由化的过程；从经济系统的角度说，市场化是一个商品化、价值化、货币化、金融化的过程；从经济行为的角度说，市场化是一个规范化、信用化、法制化、秩序化的过程。因此，实行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的、完全放任自流的，而是由法律、规则及规范制约和调节的。市场化是一个包含着人类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所有领域深刻变化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内涵和意义都是非常丰富的。

见解之四是明确指出了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存在着基本社会制度选择。笔者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改革必然是市场趋向的改革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作出什么样的基本社会制度安排，却是存在选择空间的，这种选择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不可回避的。因此，“主义”之争和选择，并非人们有意制造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必须作出的选择，同时这也是在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不同选择。应该客观地承认，转型除了市场趋向的共性之外，还是存在社会基本制度选择的差异的。这并不能简单地用“激进”或“渐进”的字眼来模糊这一分界。如果我们从基本的走向和演进轨迹来看，则可以发现一条非常明显的发展曲线：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呈现一种由“完全排斥论”到“主辅论”，又到

“结合论”，直至终于确认“市场经济论”，即承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具有商品（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经济运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同时还存在着另一条理论的分叉，即从“完全排斥论”到“主辅论”和“结合论”，又到“完全排斥论”的演进过程。第一个“完全排斥论”是用社会主义排斥商品（市场）经济；第二个“完全排斥论”是用商品（市场）经济排斥社会主义，认为要搞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只能搞私有制，只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就又回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天然同一的认识的起点。所不同的是，开始是用社会主义排斥商品（市场）经济，现在是用市场经济排斥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体制模式的建立，需要一个重要的理论和逻辑的前提，即实现商品（市场）与特定产权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的剥离。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理论和逻辑上得以成立，首先从理论上确定商品（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它并不直接与某种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等同。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发展过程，笔者称之为实现商品（市场）经济与特定产权关系或基本社会制度相剥离的理论发展过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比原苏东国家的改革见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创建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提出并显出威力，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理论上的彻底，这种彻底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实现了商品（市场）经济与特定所有制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离。由于这一理论剥离的完成，不仅彻底扫除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且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建、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复兴找到了基础和前提，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这样，既从理论上说明了社会主义可以与商品（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客观依据，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如何与商品

(市场)经济结合的重大任务和历史性课题。这些问题的不断解决,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课题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分析了社会主义转型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笔者通过对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构成要素的比较,把社会主义转型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分解并概括成经济决策机制、价格机制、动力机制、竞争机制、货币机制五个要素。在对上述各个要素分别考察后,又把它们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得出了如下见解:

社会主义转型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是非常特殊的,其特殊之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存,共同调节着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即所谓的“双轨”状态。二是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不稳定,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动状态中。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整个过渡期间,总的趋势是,社会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由行政计划机制配置资源向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基础性的机制配置资源转变。但是,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之间此消彼长的变化,并不是直线式发展的,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着互相竞争、磨擦和对抗的矛盾关系,因此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呈现出波动起伏的复杂情景。由这两个最显著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特征所决定,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在资源配置上表现出以下主要的具体特征:第一,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扩展和深化,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经济结构不断得到改善;第二,寻租行为普遍化,经济视野短期化,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秩序混乱,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和消费倾斜,阻碍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第三,在分权与市场分割的矛盾中努力建立起统一的市场和竞争秩序;第四,积累和创新不足,对外资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把产权制度的改革推到了中心地位。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实施“政企分开”的前提是改革企业产权制度。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交换的经济,其交易的内容本质

上是产权，因而市场经济对产权制度便存在一系列最一般的要求。所以，在由传统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模式向市场经济的分权模式转变过程中，不仅应从行政性分权转向经济性分权，而且必须重构企业产权制度，使企业对其全部资产独立享有全部法人财产权，国家只享有出资者的权利，这样才能避免政府随意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分权化决策机制。换言之，只有“政资分开”，才能“政企分开”。同时，笔者又指出，社会的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产权制度和运行机制是不应割裂的。一个经济，如果只建立私有产权制度，而不存在竞争性的市场，社会就不可能有效地制约个人私欲的膨胀，私有产权就会成为垄断市场、巧取豪夺和滥用权力的基础；相反，如果形成了竞争性经济格局但却没有建立私有产权，人们之间的利益竞争缺乏稳定制度规范，就会成为短期行为、寻租、过度竞争、国有资产流失、经济秩序混乱和政治腐败的制度根源。斯蒂格利茨通过俄罗斯和中国广东改革经验的对比，得出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中重要的是建立竞争秩序，产权制度的改革不重要的结论，并以此来否定自亚当·斯密以来（东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同样也是过于轻率了。

课题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分析了社会主义转型经济的政府职能转换。笔者首先归纳和总结了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政府职能认识的演变过程，并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下主要见解：

其一，政府经济职能应严格限定在存在市场缺陷的领域，这基本上已形成了人们的共识。但本课题提出，如果研究仅此还不足以界定政府职能的合适范围，人们还必须进一步回答以下问题：政府在修补市场缺陷上是万能的吗？或者说，所有市场缺陷政府都能够修补吗？笔者的研究结论是：人们似乎有一种错觉：政府能够修补所有市场缺陷。一旦发现市场缺陷，马上就想到设

立一个相应的政府机构，颁布一条行政命令，实施一项管制措施，增加一项政府职能，而不去分析一下这些行政行为究竟能不能、或在多大程度上奏效，或者分析一下这些措施在带来某些正效应的同时是否会带来更大的负效应。结果有些行政干预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甚至恶化。实践证明，对于某些市场缺陷，政府确实能够有效修补，而对另一些市场缺陷，政府目前尚无能为力。如果勉强去修补，就会造成“政府失灵”或“政策无效”。“政府失灵”往往比“市场失灵”的后果更严重。因此政府经济职能只能限于那些能够修补的市场缺陷。对于无力修补的市场缺陷，与其硬性干预，不如任其自然。这如同医生能够治愈某些疾病，而对另一些疾病则无能为力一样。对于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病人还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对付它，让带病器官继续运转，而不能盲目注射药物或手术切除。

其二，笔者对于政府失灵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对于政府失灵问题，人们往往倾向于用决策及其执行的偶然失误来解释，但这种解释是非常肤浅的。现代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对此作了多侧面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线索。笔者认为，政府失灵存在以下基本原因：第一，信息不完全；第二，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经济人行为；第三，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第四，政府机构的能力有限。

其三，笔者提出，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同样要遵循成本—收益规则。因此，不仅意味着，政府职能只能限于政府有能力修补的市场缺陷，而且意味着，对于每一个政府能够修补的市场缺陷，政府未必都应该去修补。因为，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政府行使经济职能时所能带来的好处或收益，但忽视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或成本。从本质上讲，政府行使职能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有收益亦有成本，只有当其收益超过成本时，才是经济合理的。所以，政府在考虑是否履行某项职能时，首先要作成本—收益分析，这

是所有经济活动中通行的准则。根据统计资料获得的难易程度，政府运行成本可分为两部分：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如何减少乃至消除政府运行的隐性成本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最根本措施是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活动和政府直接经营企业。

其四，笔者根据把政府经济职能分为核心政府职能、适度政府职能和积极政府职能三个档次，提出，从核心职能到适度职能，再到积极职能，所要求的政府机构能力逐步提高。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给自己的职能进行定位时，不能一味贪大求多。对于那些机构能力弱的政府，如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府，首先应该行使好政府核心职能，如果机构能力尚有节余，方可增加一些职能。随着政府机构能力的提高，可适时增加一些职能，但这需要经历一个政府机构能力逐步发育的漫长过程，能力脆弱的政府不能操之过急。值得一提的是，政府行使微观经济干预，直接经营和管制企业，需要有很强的机构能力，除非特别需要，不可贸然行之。基于以上分析，深化政府职能转换除了需要改革政府机构、压缩政府规模以及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政企分开以外，更重要的是需对现有政府职能进行彻底清理并加以分解，使政府专注于自己的应尽职责。对现有政府职能应沿以下四个方向进行分解：第一，保留、强化应尽职能；第二，一部分职能转交给行业协会、中介组织行使；第三，一部分职能转移给市场或借助市场实现；第四，一部分职能还给企业。

课题研究的第四个方面是分析了社会主义转型经济的宏观调控运行。

首先，笔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一模型的要点是把表明市场经济关系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率作为收入—支出模型的基础。由于总成本中的固定成本是由上一期的资本存量价值和投资所决定的，从而是一种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同

时均衡。这种存量与流量的同时均衡来自于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而利息率则同时调节投资、资本存量价值和货币供求。由此可以把实际领域与货币领域或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一个资产负债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货币金融体系的内生的货币供给。

为此，笔者对主流经济学关于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这一教条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外生的货币供给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本世纪初美国中央银行成立之前，美国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运行了二百年，而且符合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示的规则性。美国中央银行成立后并没有把以前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完全改为由中央银行进行，只是在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內生的货币供给体系中调节货币供给，决定货币供给和自动调节货币供求的是商业银行和企业。理解內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对于理解市场经济的性质和运行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如果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则经济增长率和企业是否赢利以及经济波动将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然而，在存在着商业银行的金融体制下，货币供给将不再完全是外生的，而是內生的。给定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率，则货币供给取决于储蓄存款，这是內生的货币供给的基础。我国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变动所表示的內生的货币供给的变动也可以表明这样一点，即货币供给并不完全是由中央银行所控制的，企业对贷款的需求和商业银行对向企业贷款风险的考虑对于货币供给是重要的。这种內生的货币供给对于考察名义增长率的变动和经济波动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笔者采用了前面的理论模型研究了我国在 1990—1998 年期间的经济波动。通过研究我国名义 GDP 增长率的变动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发现，导致货币供应量和名义 GDP 在 1992—1995 年经济极度扩张和 1997 年之后的严重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我国货币体系特殊的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中央银行自 1992 年对商业银行实行准备金制度后并没有采用严格的资产负债管理,致使商业银行并不考虑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和执行严格的资产抵押贷款程序。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和名义增长率的提高,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增加而引起更大的贷款需求;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个人利润、利息收入的增加又使得储蓄存款增加,从而导致商业银行贷款的增加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这种扩张必然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当经济转向收缩时,一方面使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信贷风险增大,这使商业银行产生惜贷现象;另一方面,经济的萎缩所造成的生产能力普遍利用不足使企业几乎找不到投资机会,由此产生企业的惜借。这两个方面使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的下降使名义 GDP 增长率下降和储蓄的增长率降低,而且商业银行借贷差的大幅度上升使货币供应量进一步缩减。这种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进一步加剧了当前的经济紧缩。

总之,自 1997 年开始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总需求不足,虽然与 1994 年以来中央银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但这种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和总需求不足并不是需求结构问题和企业经营不善等“微观”原因造成的,而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所导致的经济周期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 1992-1995 年过高的名义增长率所导致的资本存量价值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所占比重的大幅度下降。这一点对于讨论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研究分析表明,导致从 1997 年开始的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转型期的特殊的经济体制。因此,笔者探讨了中国经济体制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分析受到其实物经济分析方法的局限,如其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完全采用生产函数,这种方法无法表明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我

们这里则把分析的重点转向市场经济的货币金融体系运行的内在机制。这种内在机制在我国运行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缺乏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金融市场发展虽然为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但它缺少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即资产抵押，这是目前金融体系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商业银行的贷款并不完全是或主要不是基于资产抵押和信用担保，而是基于对企业发展的预期，换句话说，不是基于资本存量的抵押，而是基于对未来收入流量的预测。这种缺乏信用基础的银行信贷是与缺少完善的资本市场密切相关的。由于不存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从而使收入流量与资本存量之间缺少联系，利率只是联系到成本和对收入流量的预期，而不能调节资本存量价值。利润流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增加的货币供给，上述原因使货币金融体系在微观上执行配置资源的功能时，会导致信用关系的紊乱或货币供给的不稳定。由此给中央银行的信贷总量控制带来了困难，即当中央银行加强信贷规模的控制时，会使金融市场的微观效率下降，并且势必减慢金融体制改革进程，而一旦放松金融管制，则会出现信贷规模的失控。

第二，企业的预算约束扭曲着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货币化的过程，要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必须要有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的建立是与企业的预算约束分不开的。从某种角度讲，企业与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构成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或者说，企业的改革是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一部分。

第三，我国缺乏能够使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市场或货币金融体系，妨碍着使货币供给由内生机制来发挥控制的功能。而过渡时期的货币供给将表现为由国家财政控制与货

币金融体系的部分内生的货币供给共同起作用的机制。这一机制的特点是，无论是政府财政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还是货币金融体系，其货币供给主要取决于收入流量而不能与资本存量或资产抵押联系起来。但同时资本市场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在逐渐形成并发挥一定的作用。导致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脱节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这里不存在能够使资本品存量进行交易的市场，如企业很难破产和被兼并，股票市场的不发达也使资本存量的定价和交易发生困难；另一方面，银行的货币供给或贷款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依据资产抵押。

第四，我国资本市场结构偏差较大。其中一个很大的缺陷是房地产没有真正进入市场。在国外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中，房地产价值要占到资本存量价值的 50%—70%，而房地产又是作为银行信贷的主要抵押品而联系到货币供给。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与货币金融体系的健全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缺乏与货币供给相联系的有效率的资本市场，联系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利息率并不能起到其调节作用。当缺少利息率调节货币的供求，就不能建立起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中央银行也必须采用贷款规模控制来调节货币供应量。

课题研究的第五个方面是分析了社会主义转型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笔者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业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笔者在研究转型时期的产业结构演变动因的框架内，不仅分别依此考察了制度和体制环境、需求结构、自然资源和要素禀赋、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世界经济格局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而且论述了转型时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问题，特别着重研究了转型时期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笔者提出，产业政策就其本质来讲，是政府采取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之间的分配。这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方向不同于资源在市场机制引导

下的资源配置方向。产业政策的存在是否合理，关键在于产业政策引导下的资源配置是否比市场机制引导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高，是否能够增加社会福利。而且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表明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产业政策。仅仅存在“市场失效”并不能说明以产业政策的方式来调节资源配置就是合理的；只有推行产业政策不至于引起政府失效问题时，或者引起得政府失效问题的成本明显低于由市场失效问题引起的成本时，产业政策的推行才是合理的。

第二，笔者对中国和前苏联以及东欧等主要转型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提供了依据。研究表明，东欧各国的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都持续下降（罗马尼亚除外），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就业人员从第二产业（波兰包括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从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或衰退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从中我们可以推论出，在这一时期内，第三产业对于减缓这些国家的衰退，稳定经济形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衡量产业结构偏差方面，笔者运用了库兹涅茨模式（本课题称为第一标准）、钱纳里等模式（本课题称为第二标准）、赛尔奎因模式（本课题称为第三标准）。研究表明，与“标准”相比，我国产业结构呈现以下特点：首先，GDP 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偏高，服务业比重偏低。1998 年，我国第二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三标准，只与第一标准接近。比其他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比重要高 10—20 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各种标准，而且比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比重低 10—20 个百分点。其次，与第一、二标准相比，就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偏高，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更高于亚洲新

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服务业比重偏低，比发展中国家1996年的水平低22.1个百分点，比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低37.7个百分点。当然，所谓“标准”，只能作为分析问题的参考，并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这些标准所体现出的规律性，比如在一定范围内，随着人均GDP的增加，第一产业所占GDP和就业人员的比重减少，而第二、三产业所占GDP和就业人员的比重增加，等等，这些规律我们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笔者探讨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选择。研究表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是制约经济健康和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生产抵御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经营风险的能力低下；工业生产结构单一，技术水平较低，高新技术产业仍未能发展壮大；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内部发展不均衡，结构不合理；行业协调管理不力，地区产业结构雷同。但也应该看到，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我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呈显不断优化的趋势。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一些以往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功能的因素已经明显弱化，市场机制有效调整产业结构的条件开始形成。比如：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之间合理的比价体系开始形成，非价格竞争力成为决定大部分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企业之间竞争“升级”，有利于资源在区域间合理配置的因素增加，等等。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开始出现了市场竞争中“自动”趋向合理的可能性。因此，调整、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在利用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搞好统筹规划，发挥中央、地方政府部门的积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规模、技术水平、产业组织结构、产业布局都要尊重市场选择。无论是原有产业的升级，还是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都要围绕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和长期发展潜力进行，不能单纯强调规模标准、技术标准，也不能单纯从地区利